

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的 T 形题记框^{*②}

¹ 今枝由郎 著 ² 张长虹 译

(¹ 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 巴黎; ²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成都, 610064)

内容摘要: 关于榆林 25 窟, 学界较多关注的是其壁画风格与年代。本文则从该窟壁画的 T 形题记框入手, 并结合莫高窟发现的 T 形题记框进行比较分析, 认为 T 形题记框可以作为洞窟断代的可靠依据, 精确地推断其所在壁面的年代为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 786—848 年。由此推断榆林 25 窟的开凿始于 821/822 年和盟签约之后不久, 但三面壁面壁画的绘制有年代上的先后差异。东壁的壁画可能是吐蕃占领时期最先以藏式风格绘制的, 其余诸壁的壁画则可能创作于 848 年汉人恢复这一地区的统治之后, 尽管遵从了最初的规划和图像, 但壁画完全是以汉地的风格绘制而成。

关键词: 榆林 25 窟 藏文题记 T 字形题记框 吐蕃占领敦煌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 马休·凯普斯坦敏锐且令人信服地断定安西榆林窟 25 号窟是一座会盟窟 (gtsigs kyi gtsug lag khang)^③, 系为了纪念公元 821/822 年汉藏和盟而建, 此次事件在伯希和藏敦煌藏文文书 P. t. 16/IOL TIB J 750 中有详细记载。的确, 就壁画配置的图像而言, 东壁大日如来像居中, 两侧为八大菩萨 (现仅存大日如来右侧的四尊菩萨); 未来佛弥勒和阿弥陀佛的净土分别描绘于北壁和南壁, 恰好与敦煌文书中的描述吻合。^④ 该文论证出自敦煌的一件藏文文书与榆林现存的一座洞窟之间的直接联系, 这座洞窟位于距敦煌约 100 公里的地方, 从这一点上讲, 凯普斯坦先生的研究新颖而独特。因此, 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榆林窟 25 窟是汉藏 821/822 年和盟的结果这一结论。

* 本文译自 Yoshiro IMAEDA, F-shaped Inscription Frames in Mogao (Dunhuang) and Yulin Caves, 日本西藏学会会报, 第 53 号, 2007 年 6 月。

② 在此我要向敦煌研究院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尤其是罗华庆、范泉和殷英三位, 在我参观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期间提供了诸多便利。另外, 还要感谢马休·凯普斯坦先生 (M. Kapstein), 他在这篇短文诞生之初, 即通读了初稿并向我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

③ 马休·凯普斯坦 (Matthew Kapstein): 《德噶·玉蔡会盟寺: 比定与图像》(The Treaty Temple of De-ga g. yu-tshal: Identification and Iconography), 《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98~127 页。

④ 马休·凯普斯坦 (Matthew Kapstein): 《德噶·玉蔡会盟寺: 比定与图像》(The Treaty Temple of De-ga g. yu-tshal: Identification and Iconography), 《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11~114 页。

至于壁画的风格和年代，马休·凯普斯坦写道^①：

尽管东壁描绘了大日如来和诸菩萨，但风格上似乎与北壁和南壁描绘的弥勒和阿弥陀净土画迥然有异，通过对绘画创作的仔细研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属于不同时期的作品或由不同的画坊创作而成。更近距离的风格比较——注意一些细节，比如发式、服饰和笔触——表明事实上恰恰相反。不过最令人疑惑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同一组艺术家的作品，他们试图在努力完成一种使命，即除了创作他们较为熟知的佛界绘画之外，还要创作他们并不甚熟悉的以曼荼罗构图为基础的绘画类型。所以，无论是图像上还是风格上，安西榆林 25 号窟似乎体现了藏汉世界和谐共存，因此好像也特别符合双方设计的纪念和平这样一个理念。

在 2007 年 1 月 2 日同凯普斯坦先生的私人交谈中，他好意地告知了我以下一些信息：

谈到画坊的问题，Karl Debreczeny，一位极为熟悉绘画技法年轻的汉藏艺术史学者，在几年前参观了榆林 25 窟，仔细考察了绘画的技法——他同样对画笔的特点也很了解——他认为整个洞窟壁画系由同样的艺术家绘制而成，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会努力澄清这一点。^②

由此可见，他认为，尽管东壁的壁画与北壁和南壁在风格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仍然是由同一画坊的艺术家在同一时间创作的。不过，我认为，对艺术家身份和创作时间的判定是两个不同的话题，应该分开讨论。由于我不是一名艺术专家，所以就将对艺术家身份的判定这一问题留给艺术史学者。

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些壁画的创作时间，我将尝试从一个不同的途径来看待这一问题。正如凯普斯坦先生令人信服的论证，安西榆林窟 25 号窟是 821/822 年汉藏和约会盟的产物，因此，我们就很自然地推测洞窟的开凿工作和和约签署不久之后就开始了，但是我们没有准确的关于施工进度和完工时间表方面的信息。众所周知，有些洞窟的建造往往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数十年——并且有时中途会中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将整个洞窟归于一个同样的日期或时期。在一个单个的洞窟内，必须对其不同的部分和要素进行分开考察和断代。具体到榆林 25 号窟，这项工作还没做。东壁的藏式风格壁画^③、藏文题记的出现（后面我会再谈到这则题记）和北壁藏式婚宴场景^④使所有学者将这整座窟

① 马休·凯普斯坦 (Matthew Kapstein): 《德噶·玉蔡会盟寺: 比定与图像》(The Treaty Temple of De-ga-g. yu-tshal: Identification and Iconography), 《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23~124 页。

② 此段法文的翻译得到了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魏骏骁先生 (Patrick Wertmann) 的帮助。——译注

③ 李其琼在图版说明中只是简单地提到外来艺术的影响，但这里的“外来的”显然只能是“藏式的”。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7·敦煌中唐》，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32 页。

④ 马休·凯普斯坦 (Matthew Kapstein): 《德噶·玉蔡会盟寺: 比定与图像》(The Treaty Temple of De-gag. yu-tshal: Identification and Iconography), 《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122 页, 图 10。

断代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即从公元786年至848年。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在2006年9月,我曾有机会访问了25窟,引起我兴趣的不是东壁绘画与南壁和北壁绘画风格的显著区别,而是题记框形状的不同。东壁的题记框都均为T字形。在现存的壁画中共有六则题记框:五则位于大日如来的右侧,一则位于左侧。这些题记框中垂直的部分均有汉文题记(只有紧临大日如来右侧的一则没有题记)^①,但是水平部分的题记框里全为空白。不过,考虑到该窟的性质是纪念汉藏和盟,并且藏文是水平书写的事实,毫无疑问,这些水平部分的空白原先是为藏文题记预留的。

事实上,早在1980年,黄文焕先生就已经最早注意到这种独特形制的T字形题记框^②,但是他的重要论述未被其他学者注意到。莫高窟第365窟的藏文题记提到有着神圣起源的西藏赞普具有幻化('phrul)的本领['phrul gyi lha (b) rtsan pho, 幻化的神赞普],赤祖德赞(约815—838年在位)时期,水鼠年(832年)和木虎年(834年)为这个窟的始凿和完工时间^③。关于这则题记,在这篇短文里黄文焕注意到T形框是吐蕃占领时期石窟的共同特征,他还提到其他两个例子,第75窟和251窟均是如此。榆林第25窟东壁的T形题记框则是又一个例证,再次补证了黄文焕先生的观点。

相反,南壁和北壁没有一个题记框是T字形的,它们都是竖长方形,并且全部空白,只有北壁的一个题写有藏文题记。不过,单是这则题记的存在并不能提供可靠的证据将之断代为吐蕃占领时期,因为正如一些研究充分论证的那样,尤其是武内绍人的研究,表明即使在848年吐蕃军事占领结束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除了藏族,这一地区的各种民族、操各种语言的族群仍继续广泛使用藏语。^④那么我们再仔细考察一下这则题记本身,

① 他们是:地藏菩萨(上方左侧)、虚空藏菩萨(上方右侧)、文殊师利菩萨(下方左侧)、大日如来右侧的弥勒菩萨(下方左侧)和左侧的清静法身(毗)卢舍那菩萨。

② 黄文焕:《跋敦煌365窟藏文题记》,载《文物》1980年第7期,第47~49页。

③ 迄今,这肯定是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发现的唯一的最为重要的藏文题记,尽管在保护上,自黄文焕考察之后题记有些脱落,所以当我在2006年9月考察时,一些他当时尚能识读的字母已经不可辨认。至于仍可辨认的部分,黄文焕的识读是可以肯定的,除了一个字母以及他没太关注的 shad。下面是题记全文,仅一句:(1.1) // 'phrul gyi lha (b) rtsan pho // khri gtsug lde brtsan gyi sku ring la // sku yon sems can thams chad gyi bsam... hong pen / (1.2) sgos // gtsug lag khang ' di / chu pho byi ba'i lo'i dpyid na btsugs te // shing pho stag gi lo' i ston... // ston sla ' bring la // sku gzugs spyang phyed te / zhal bsros so / (结束)。

非常有意思的是,sku gzugs spyang phyed te / zhal bsros 在藏语中是个不常见的表达法。第一部分 spyang phyed,无疑是汉文“开眼”的书面翻译,用于造像和塑像的开光仪式。至于 zhal bsros,“暖脸”?据我所知,没有对应的汉语,仍是一个谜。

至于第三行,tha tha dang sag then... smon lam du gsol,它是由完全不同的手书写的,年代要晚得多。在T形题记框的大竖框内有一长长的汉文题记,不幸破坏严重。参见梅林:《莫高窟第365窟汉文题记重录并跋》,胡素馨(Sarah E. Fraser)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362页。

④ 武内绍人(Takeuchi Tsuguhito):《从归义军时期到西夏时期藏文文书和藏语的使用》,《东方学》104,2002年版,第106~124页。

《从吐蕃统治末期到西夏时期东突厥地区藏语使用的社会语言学暗示(9—12世纪)》(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Use of Tibetan in East Turkestan from the End of Tibetan Domination through the Tangut Period, 9—12th c.), Turfan Revisited, P. Zieme (ed.).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2004, pp. 367—374.

《后吐蕃帝国时期古藏文佛教文献(9世纪中叶至10世纪晚期)》(Old Tibetan Buddhist Texts from Post-Tibetan Empire Period, Mid 9th to Late 10th Centuries),《古藏文研究2:第十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Old Tibetan Studies 2: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Cristina Sherrer—Schaub (ed.). Leiden: Brill (待版)。

它只有 20 个音节构成，但是由于它是被书写于一个竖长方形框内，所以被分成九行，每行只有一个、两个或最多三个音节，这显得十分奇怪，因为壁面尚有足够的空间来绘制一个水平式的题记框，会更适合于水平式的题记。完整的题记如下：(1.1) //dze' u (1.2) de' i cung gyis (1.3) (') phag pa' (i) (1.4) (') khor cig (1.5) bgyis pa' (1.6)' di shang she' i (1.7) sku yon du (1.8) bsngas (=bsgos) pa' (1.9) lags so//。可以翻译成：“Dze' u Dei' -cung 施画此圣图，此乃回向‘Shang she’之功德”。Dze' u Dei' -cung 和 Shang-she 的身份很难准确断定，但很有可能 Dze' u 是 10 世纪统治敦煌的汉族曹氏的发音。^① 无论如何，这则题记与壁画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是后期的胡写乱画，就像该窟其他地方发现的随意涂写的藏文、回鹘文和汉文题记一样。^②

至于藏式的婚宴场景的出现^③，这样的场景在吐蕃占领长达六十余年的敦煌地区想必很常见。但是在这样长时期的占领之后，吐蕃的影响在民族构成、习俗等方面肯定不会立即消失，一定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类似的，藏语作为一种混合语，即使在 10 世纪仍被广泛使用。

简而言之，无论是藏文题记还是藏式婚宴场景都不能构成可靠的证据，将北壁的壁画归于吐蕃占领时期。

至于南壁，描绘的是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没有可供断代的元素。但是我们有趣地注意到场景的描绘是基于《观无量寿经》，它与《无量寿经》的两个版本（大的和小的）一起构成了阿弥陀佛世界的三部曲。^④ 这部经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否源于印度，很有可能它是汉文的伪经，并且从未被翻译成藏文。由此，南壁的壁画则完全是汉式的，无论在风格上还是题材上。

如果比较东壁、南壁和北壁，最大的不同是题记框的形状：东壁为 T 字形，而南、北壁则为竖长方形。这不是简单的绘画风格不同的问题，一定还有其他的解释。考虑到敦煌地区 9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背景，对这种差异的唯一解释应该是政治和军事政权的变化，吐蕃的统治被张义潮的归义军政权所取代，后者在 821/822 年唐蕃和盟的 25 年之后，即 848 年重新收复了敦煌地区。在唐蕃和盟至吐蕃统治结束这一段时间内，设计 T 字形的题记框以书写汉藏文的题记一定是十分必要的，但在 848 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这或许可以解释该窟中不同壁面 T 形题记框出现和缺失的问题。在这种假设下，东壁壁画与南、北壁壁画的创作年代之间也一定会有重合的时候。

在确凿证据完全缺乏的情况下，关于榆林 25 窟三面壁壁画创作的确切时期，从以上的讨论可以概括出我的推测。该窟的开凿始于 821/822 年和盟签约之后不久，最初的规划和图像也一定是由当时占领这一地区的吐蕃政权设计的，东壁的壁画一定是吐蕃占领时期

① 谢继胜、黄维忠：《榆林窟 25 窟藏文题记释读》，法藏敦煌藏文文献首发式暨敦煌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兰州，2006 年 9 月，发表原稿。另，该文又发表于《文物》2007 年 4 期。——译注。

② 当然，前室南壁前侧（东侧）的汉文题记清楚地表明年代为光化三年（900 年），早期的学者如斯坦因误以为这是该窟的建窟年代。

③ 段文杰：《榆林窟的壁画艺术》，见敦煌研究院编：《安西榆林窟》（中国石窟），平凡社，1990 年，172 页。马休·凯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德噶·玉蔡会盟寺：比定与图像》（The Treaty Temple of De-ga g. yu-tshal: Identification and Iconography），《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21~122 页，图 10。

④ 段文杰：《榆林窟的壁画艺术》，见敦煌研究院编：《安西榆林窟》（中国石窟），平凡社，1990 年，174 页。

最先以藏式风格绘制的,其余诸壁的壁画则可能创作于848年汉人恢复这一地区的统治之后。尽管遵从了最初的规划和图像,但壁画完全是以汉地的风格绘制而成。

综上所述,我认为T字形题记框可以作为洞窟断代的可靠依据,或精确地推断其在壁面的年代,为吐蕃占领敦煌的786年至848年。迄今为止,只有黄文焕注意到了这一点,引用了三座洞窟:敦煌莫高窟第75窟、251窟和365窟。榆林25窟是第四个例证。如果可能的话,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对类似的例子建立一个完全的序列并识读其中仍可辨认的藏文题记将是十分有意义的。^①

^① 除了晚期的胡写乱画,我们已经发现,除了365窟的一处外,另有一处藏文题记书写于T字形题记框内。它位于第75窟,识读如下:(1.1) byams pa sprul pa' i gtsug lag khang gi yon (1.2) bdag yang beng' co' i rkyo (?) ……(遗憾的是,结尾处已经被毁不在了),“Yang beng' co, 弥勒殿的赞助人,不可思议的……”Yang可能对应于汉族的姓“杨”。根据敦煌研究院的解释,此窟目前的壁画不是原来的,在该层壁面之下尚可见到部分壁画。该窟目前的状况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原先是一座献给弥勒佛的殿堂。